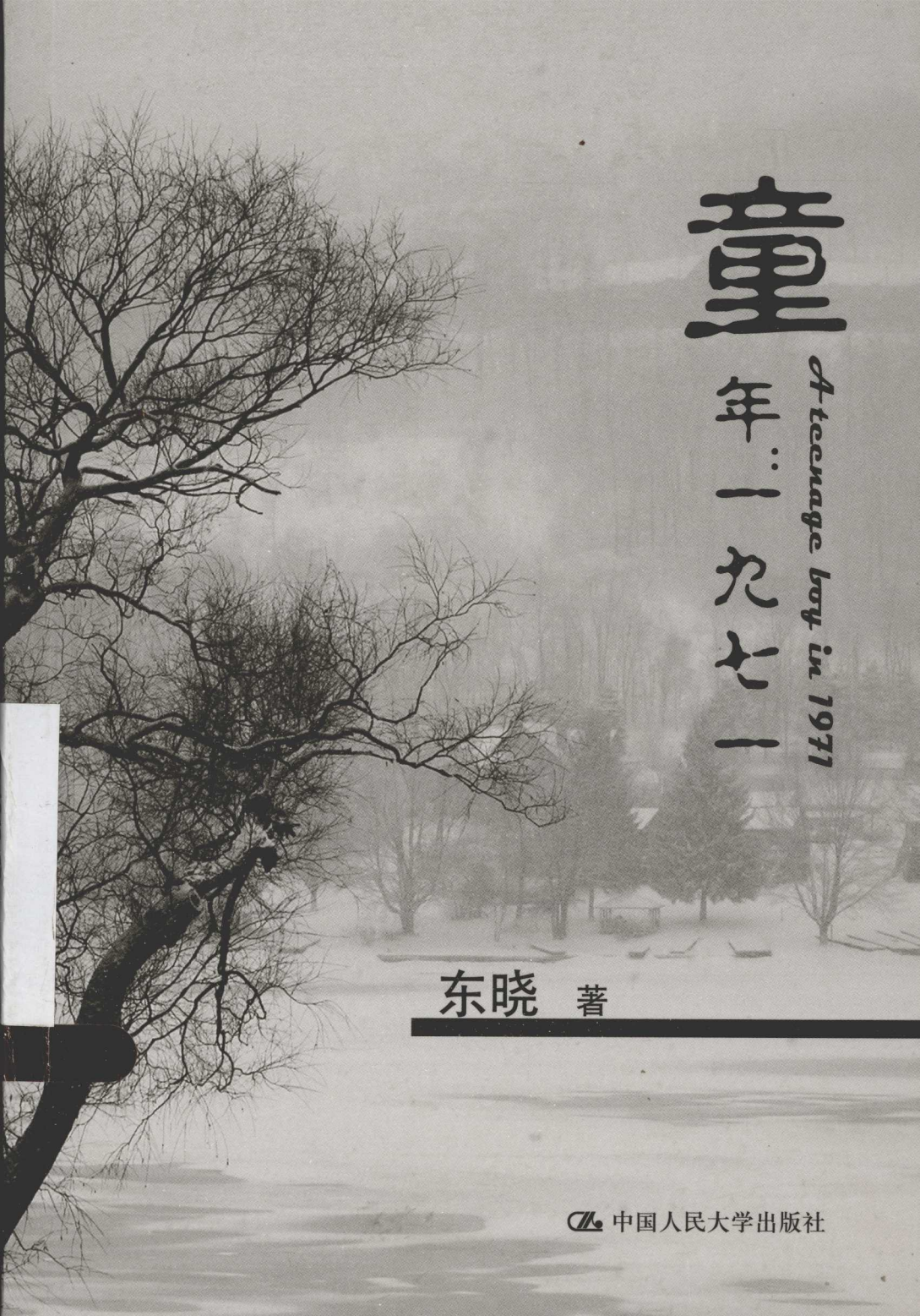




童

年：一九七一
Adolescence boy in 1971

东晓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4043135

1247.57
3399

童

年一九七一
A teenage boy in 1971



东晓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1247.57
339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一九七一/东晓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300-19023-5

I. ①童…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2243 号

童年：一九七一

东晓 著

Tongnian: Yijiuqi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印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5.6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3 000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根据作者亲身经历而写成的小说。小说描写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一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董三明的故事。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董三明的全家被下放到了农村，但后来由于一种罕见地方病的威胁，董三明只身回到了县城，在一所小学继续读书求学。小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观察一个荒唐年代的人和事，把并不久远的故事用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再次唤醒人们的沉痛记忆，对将来或许能有些启迪。

故事发生在北国边陲的一个小县城。董三明在早春二月离家进城，开始读初中一年级。尽管他聪颖本分，品学兼优，但因家庭成分不好，处处受挤，备受歧视。他的父亲董维之多次通过组织申诉表白，要求重新审理当年土改时成分错划一案，但每一次都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最后险些被开除党籍。小说还生动地描写了众多相关人物：单纯美丽心地善良的班主任女教师吴梅，满腔热忱却受父亲冤案牵连，被逼婚但不肯就范而投井自杀；才华横溢激情热烈的城市青年大学生严大中老师，在小镇政治高压下一败涂地，不得不逃离现实，远游他乡；内心不安分想靠搞政治改变自己命运的农

村青年王秋山，风光一阵后最终还是被抛弃。董三明在县城上了一年学后，因父亲受到党内处分，城镇户口被取消，他含泪再次回到乡下。小说还描写了董三明的几位好友，如直言快语的鲁小钢，美丽善良的李玲玲，内心憨厚的尹顺吉，以及善于独立思考的钢厂工人双木。文中还提到了许多“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比如老三篇、忆苦思甜、开门办学、文艺宣传队、天天读心得体会、知青等内容。

小说行文流畅，故事曲折生动，题材新颖独特，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一个政治疯狂的年代如何生存。他们不求吃得好，不求穿得好，只求在政治上得到一个公正的名分，而这个名分现在看来是如此荒唐，微不足道。

献给我同时代的人

目 录



第一章	回城	1
第二章	开学	10
第三章	天天读	16
第四章	大米饭事件	28
第五章	活学活用	33
第六章	忆苦思甜	41
第七章	老董	48
第八章	写检查	59
第九章	毒草	66
第十章	回家	74
第十一章	学农	86
第十二章	宣传队	99
第十三章	北大河	110
第十四章	小吴老师	125
第十五章	翻案	145
第十六章	再次下放	158
后 记		167

第一章 回城



一九七一年，董三明十三岁。那年，他就独立门户，自己过日子了。

一年前，董三明一家，坐着供销社的马车，从县城被下放到了五十里以外的王家窝棚，插队落户。那时，他父亲已经从“牛棚”里解放了出来，不再是“牛鬼蛇神”，不再是“黑帮”，而是光荣的“五七”战士，随即便被发送到了“五七”干校，继续接受锻炼。虽然身份不一样了，但待遇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在“五七”干校吃饭管够。他父亲不是走资派，在县委机关里，只是个小职员，但机关里按比例要揪出几个坏分子，以显示“文革”运动有了成果，便给他定了罪名：地主翻案分子，只因为他以前曾给老家写过信，要求重新审理当年错划的家庭成分。

王家窝棚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讨不上媳妇的光棍儿特别多。这里的人很多是闯关东的外来户，投靠更早年闯关东的乡亲好友。而每次政治运动，都会伴随着一茬又一茬的关里来客。王家窝棚穷，但好歹还能喝上稀的，关里更穷，闯关东到关外是为活命。村

子里几年前从山东来了个讨饭的年轻女子，二十岁出头，投奔她的一个远房亲戚，但没想到那位亲戚几年前就离开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姑娘绝望了，走到村头的一棵老榆树下，满脸是泪，不想活了。在村里人的劝说下，她答应谁能收留她，就给谁做媳妇。生产队里喂马的老光棍儿，四十多岁，叫王有银，收留了姑娘，一年后，生了个大胖小子，日子过得挺美满。可又一年后的夏天，王有银锄完地下工回来，听见孩子在炕上哭闹而媳妇不见了。在孩子的枕头上，媳妇留了个纸条，说对不起他，给他生个儿子作为补偿。原来这女子在山东还有家，有丈夫和孩子，因为成分不好，被一次又一次批斗，来东北是为了逃命，也是为家里人省一张吃饭的嘴。

三明一家到王家窝棚不久，当医生的母亲田敏就发现，三明总是犯困，浑身无力。王家窝棚有种奇怪的地方病，叫大骨节病。患病的人骨节粗大，关节僵硬，他们每天早晨起来先要扶着炕沿，横着走几趟，把关节活动开了，才能走路，且走路时一摆一摆地左右晃。一开始，三明还觉得那样走路挺有派头挺豪迈——红卫兵就是那样走路的，腰里扎着皮带，而且常常是走在路的中间。但妈妈告诉三明，在王家窝棚，这是一种很痛苦且无法摆脱终生不愈的病态。这些人的手指永远不能伸直，弯曲的手掌永远无法张开，尤其是粗大的指关节，严重时像是糖葫芦串。想到正在发育中的三明，母亲忍痛决定，将儿子送回县城，在城里上学。

二月的北方，天气依然寒冷。积雪厚厚地压在农田上，一些枯草从雪中探出头来，在寒风中艰难地摇曳着。路旁立着歪歪斜斜的标语牌子，上面的宋体大字依然清晰：“农业学大寨”，“大干苦干加巧干，敢教日月换新天”。几只墨黑的乌鸦停在标语牌子上，一动不动，甚至都懒得叫一声。在农村已生活了一年的三明知道，这是农村正在搞的新运动，说是把冬闲变冬忙，越到过年的时候越要忙，这样才有轰轰烈烈的效果，才能体现政治运动带来的变化。还

特别要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在地里干上小半天，在冰天雪地里挖沟挖渠大搞水利建设，为夏天用。

母子二人还是搭着供销社的马车，但这一次是前往县城。他们要赶在开学前，安置好住处。赶车的老板是五十来岁的秦来富，个子不高，典型的庄稼人，戴着大狗皮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这棉袄棉裤都是老式的那种，是他能干的媳妇缝的。棉裤的裤腰很高，很肥大，差不多到了腋下。穿的时候，打个褶，用布条一扎。因为棉花絮得很厚，裤子可以倒立在炕上。他脚上穿的，是高筒毡靴，里面塞满了乌拉草。尽管如此，他还是冻得直打战。他的胡须、眉毛、帽子上都结满了白霜。

看着马跑得有些累了，秦老板喊了一个长声：“吁——”。几匹马慢下了脚步。在村子里，供销社的马车最漂亮，几匹马都膘肥体壮，令人羡慕。秦老板的辕马通体白色，发着亮光，一根杂毛都没有。脖子上的马鬃也剪得整整齐齐的，如同刀切一般。在农村，农民除了种地，不准私自卖葱卖蒜卖鸡蛋，不许做任何买卖，怕的是资本主义复辟。虽然穷，但这是社会主义，公社干部说“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家规定供销社是农村唯一的经济实体。供销社负责收购蛋禽蘑菇等农副产品，送到城里。回来时，带回油盐酱醋、布匹鞋帽、日用百货再卖给乡民。这一买一卖，赚头就大了，但这都是为的集体，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人宁可不当小学老师，也要来供销社当售货员，就是因为看中了供销社那稳定的好收入。

看着渐渐远去的标语牌子，秦老板重重地吐了口浓痰，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他想让坐在车上的母子二人听，“尽他妈的瞎折腾，干一天的活还不如开春解冻时干二十分钟，当年糊弄东洋鬼子也没这么干过，尽整景，弄得工分不值钱”。工分是人民公社特有

的记工方式。工分的价值取决于年底卖粮后能挣多少钱。卖的粮越多，工分就越值钱；但工分记得越多，工分就越不值钱。

秦老板回过头来，望了望车上的母子俩，关切地说：“冷了吧，要不要下车走几步？”

田医生跳下车来，转身又伸出手，想给儿子搭把手，但三明推开妈妈的手，自己跳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其实他更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显出自己还是个孩子。三明长着一张白净净的脸，脖子长，腿长，身子又瘦又单薄。他不爱说话，一双天真的大眼睛看什么都那么专注。这次返城，一方面他要证明自己能独立了，另一方面，他确实讨厌王家窝棚那个小学，尤其是那个总戴着一顶破草帽的校长王秋山。王秋山当过兵，在部队里入了党提了干。不过听知道底细的人说，王秋山没什么本事，是靠每天早晨给别人打洗脸水、挤牙膏穿上的四个兜（指当干部了，一般士兵只能穿两个兜的军装）。在一次全班的同学会上，王秋山大谈毛泽东思想能够如何教育人，改造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可以变成听毛主席话的好学生，考试能拿第一名。“比如咱们班上的董三明，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例子。请董三明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表面上，王秋山在表扬三明，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三明家成分不好，是地主。正如同在大街上，揪出个姑娘，告诉众人，这个姑娘现在好了，是良家妇女了。三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况且，三明从小就规规矩矩，看见蚂蚁都绕着走，打那以后，他更是抬不起头来。

母子俩在路上走了一段路，身上暖和了许多。马路的路面已冻得坚硬无比。冰、雪和着马粪，结成一层硬壳。钉有铁掌的马蹄踩在上面，划出一道道的印子。田医生望着儿子，心中充满了内疚和歉意：天底下哪个做父母的愿意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外面去过呢？

“我给你多留些钱和粮票，不想做饭就买烧饼吃。我和你马大娘说好了，她会照看你的。”

“我行。我能照看我自己。” 三明执拗地说。

“多听话，少说话。看到别人对你凶，你就躲着点走。咱和别人不一样。” 妈妈又说，但三明没有吭声。

下午三点多钟，到了县城。秦老板把母子俩送到西马路的住处后，就赶着马车，赶忙去二副食商店卸货了。

这个小县城叫吉庆镇，离北京远，离苏联近。这个小县城的所在省地处边疆，地广人稀，通常默默无闻，但因在“文革”开始那几年，干了两件露脸的大事而名噪一时：一个被称为“东北新曙光”，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在一个叫“柳河”的地方，把省委机关的一些政治上不可靠，或者不顺眼的干部、知识分子集中起来修水库、干体力活，同时对着毛主席画像“早（晨）请示，晚（上）汇报”，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同时收拾他们、折腾他们。林彪觉得这种方式不错，有利于“反修防修”，于是推荐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五月七日那天批示在全国推广，要求各行业都要办“一个大学校”。柳河这个地方成为第一个被命名为“五七”干部学校简称“五七”干校的地方。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吉庆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比别的地方“左”三分，生怕也跟苏联一样“修”了，整天吃黑面包。吉庆县是个农业县，历史上没出过什么名人，也没有什么土特产，年复一年，都是种些不值钱的玉米、高粱和大豆。县城不大，东西长三里三，南北二里二。主街东西走向，西头是国营第一副食品商店；东头是国营果品公司、朝鲜饭店；中间是小镇最为繁华的地段，有国

营第一百货商店和大众饭店一旅社。吉庆镇只有两个地方能放电影，即人民文化宫和工人俱乐部，都坐落在主街的中段。这是小镇的娱乐中心，人民文化宫和工人俱乐部相距不到一百米。小镇上的人非常精明，为了省钱，放电影时只用一个拷贝，通常是人民文化宫先放电影，放完一卷胶片后，赶紧送到街对面的工人俱乐部，那里还有一大帮如饥似渴焦急等待的观众。如果胶片送晚了，就在屏幕上打个幻灯片“胶片未到，耐心等待”。幻灯片的右下角夸张地画有一个满头大汗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背着电影胶片，风驰电掣而来。电影院看电影不是对号入座，看电影的人可多可少，全凭电影院门口把门的老周头那一天的心情，所以全城的百姓都巴结他。他比县革委会主任还风光，买猪肉从来不用肉票，每个月都能吃上好几斤上等好猪肉。

小镇的西面有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当地人称西马路。一支高音喇叭架在十字路口，早中晚播音三次，报道全国各地的大好形势。路的南端是火车站，一九三八年伪满时日本人修的，里面空荡荡的有几条木头凳子，用了几十年，还是没有要坏的样子。出了车站不远能看见一个纪念塔，好像是为解放东北而修建的，大概有二十米高，砖砌的，外面抹上一层水泥，很是简陋，像根直立的没有加奶油的大冰棍。纪念塔的旁边是第一中学，小镇上的大知识分子都集中在这里。再往南，就出城了，有一座“文革”开始不久修建的混凝土水泥桥，架在南小河上，叫东风大桥，长不过二十米，宽不过六米。建桥时，喊了很多口号，插了很多红旗。能来修桥的，都是根红苗正表现好的年轻人，随时都可以当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听说一中有个女生，没有被选来修桥，还哭了好几天。可是才几年的光景，在来来往往的马蹄车轮下，就桥面坑坑洼洼，桥栏杆扭扭曲曲，歪歪斜斜了，像是被风刮过的篱笆墙。

在上东风大桥前，有个大车店，是乡下人进城时必然歇脚的地

方。大车店门口北侧有个小土坯房，是个铁匠铺，夏天做锄头做镰刀做炉钩子，冬天则专为进城的马车服务，给马蹄子钉上钉子，称为挂掌，这样，拉车的马走在冰雪上不至于打滑。这是个细活技术活。通常把马固定在“门”字形的架子上，马肚子上捆绑两条宽带子，挂在木梁上。这样，当把马腿向上翻起来，马蹄向上时，马不会跌倒。铁匠铺的铁匠是父子俩，姓李，人很和善，周围的邻居都认识他们。老李师傅有个学名，叫李大水，但认识他的人都叫他李大锤。老李师傅的绝活是只用两分钟就能为一只马蹄钉上铁掌。他先熟练地用钳子把马蹄上磨得光秃秃的旧铁钉旧铁环拔掉，再用锋利的刀子把马掌削平。这还没完，他又从火炉里拿出一块烧红的烙铁，“嗞”的一下放在马掌上，把马掌打磨平整，然后才放上“U”形铁环，钉上七颗崭新的三角帽铁钉。老李师傅钉的铁掌可以用上一个冬天，保证不出毛病。老李师傅的儿子叫李全胜，手艺也不错，不过“文革”开始不久，小李师傅就被人连拉带扯地拽去当上了造反派，不再当铁匠了。

董三明一家下放前，就住在西马路，离大车店不远。每天都能听见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他还经常去铁匠铺捡废弃的马掌钉。废弃的马掌钉是男孩子们冬天的玩具。他们在雪地上画条横线，然后站在远处的另一条横线处把马掌钉扔过来，谁的离横线近，谁就是赢家，优先一脚把横线周围的马掌钉扫出另一条横线，赢得所有出线的马掌钉。

董三明这次回来，又回到了原来住的地方。一是因为和老邻居相处得都不错，二是因为刚好有一间民房出租，田医生赶紧租了下来。

田医生以前是县医院的大夫，认识很多人。这次大家听说她送儿子回来上学，都来看她，帮着往屋里搬东西。虽然是一个十三岁

的孩子过日子，但过家用的东西一样不能少。锅碗瓢盆、筷子勺子、油盐酱醋、米袋子锅铲子，还有衣帽鞋袜、被褥枕头，连洗衣服用的松花江牌肥皂，这次都带来了。田妈妈还为儿子带来了一麻袋煤，一大捆干柴，用来取暖烧饭。但有一事难住了田大夫：三明还太小，挑水是个大问题。这时住在隔壁的马大娘把她十八岁的儿子拉了过来：“让双木帮着挑水吧。”双木和三明以前在一起玩过篮球，踢过马掌钉。他走过来拍拍三明的肩膀：“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一年前三明一家搬到乡下时，他还送过三明一个笔记本，上书临别赠言：“让我们的友谊在冰山绝顶处开花。”三明小，这句话让他琢磨了好几天，在那个地方开花都难，还能有友谊吗？后来才明白，意思是在那样一个不毛之地开的花不容易，所以要珍惜，就像珍惜友谊一样。

待客人散去，妈妈和三明赶紧把衣箱打开，把杂物安置好，并生火做了简单的饭菜。房间并不大，还隔成了两间，小一点的是厨房，大一点的搭了一个土炕，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吃饭睡觉写作业都得在炕上。厨房的火炉生了火以后，烟火先从炕下走，暖了炕以后，再从烟筒中排出。

刚吃完饭，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鲁小钢来了，他是五八大炼钢铁那年生的，和三明同岁，以前就在一个班上课。鲁小钢瘦瘦的，剃个蘑菇头，长着大眉毛，眼睛很亮，主意多，天生就是个当领导的料。他们一家和三明一家几乎是同时搬到西马路做邻居的，那时他们才七岁。后来就一同去上小学，一直在一个班。十一岁那年，两人到南小河旁边公社的菜地里偷香瓜，被看瓜老农发现，穷追不舍，但两人时聚时散，时隐时现，声东击西，配合默契，后来竟跑回老农看地的窝棚里，坐在他的草席上，望着远处东张西望四处寻人的老农，吃瓜吃了个够。从此以后两人的“革命友谊”就更深厚了。

两个孩子见了面，高兴得跳了起来。鲁小钢家在另外一趟房，里里外外共三间。他爸是局长，待遇一直不错，但“文革”一开始，作为吉庆县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就受冷落“靠边站”了，整天在家喝酒解闷，唉声叹气的。他的另外一个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因为他一开始被抓壮丁当了国民党的兵，打了败仗后，又参加了解放军，还当了连级干部。不过他出身好，造反派也不能把他怎样。

鲁小钢告诉三明，明天就开学了，虽然是上六年级，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原来的小学六年级，就是现在的初中一年级。“不过无所谓，学什么不重要，反正都是毛泽东思想。”三明两只耳朵都竖了起来，还是似懂非懂，不知鲁小钢还想说什么。

第二章 开学



开学第一天，乱哄哄的。镇上所有该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到了一小学。“文革”刚开始时，一小学改名了，叫育红小学，但叫了不到一年，又叫一小学，原因是叫育红的地方太多——镇上还有三个叫育红的托儿所。老人送孩子时，常送错地方。小镇子不像大城市，街道没有正式的名称地址。当人们描述地址时，习惯说“屠宰厂南墙靠东第二栋房”，或者说“离朝鲜饭店不远”。

一小学的初中一年级共有八个班，每个班有近五十个孩子。毛主席的那句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前半句好理解，原来是十二年学制，现在变成了九年制，即小学五年，中学四年，中学包括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而且由原来的秋季入学变为春季入学。这都是大手笔、大动作，充分显示了对主席的忠心。这样，该上小学六年级的三明，就成了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但这“教育要革命”让这些小地方的人犯了难，不知怎样才能紧跟毛主席。不过毛主席的另一句话给大家提了个醒，“备战、备荒、为人民”。吉庆镇离“苏修”那么近，而且珍宝岛事件刚发生